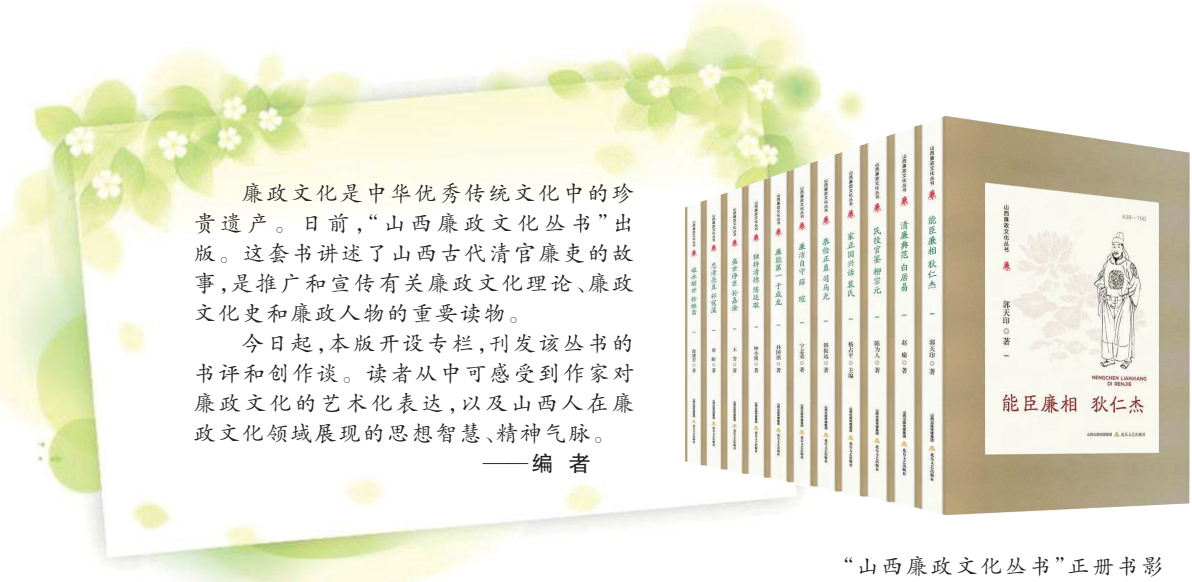


关注“山西廉政文化丛书”(1)

以人为镜明得失

——“山西廉政文化丛书”述评

杨占平



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日前，“山西廉政文化丛书”出版。这套书讲述了山西古代清官廉吏的故事，是推广和宣传有关廉政文化理论、廉政文化史和廉政人物的重要读物。

今日起，本版开设专栏，刊发该丛书的书评和创作谈。读者从中可感受到作家对廉政文化的艺术化表达，以及山西人在廉政文化领域展现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

——编者

“山西廉政文化丛书”正册书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山西调研时，对山西的历史文化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继承山西优良传统、弘扬三晋历史文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山西省宣传文化界为了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彰显文化自信，挖掘和利用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努力在廉政文化上给山西高质量发展蹚出一条新路来，为书写山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注入强大文化力量，做了许多务实工作。前不久出版发行的“山西廉政文化丛书”，就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多重价值

“山西廉政文化丛书”共计14种，由11种正册和3种副册构成。正册分别是《能臣廉相狄仁杰》(郭天印著)、《清廉典范白居易》(赵瑜著)、《民役官鉴柳宗元》(陈为人著)、《家正国兴话裴氏》(杨占平主编)、《恭俭正直司马光》(韩振远著)、《廉洁自守薛瑄》(宁志荣著)、《廉能第一于成龙》(孙国强著)、《独持清德陈廷敬》(钟小骏著)、《盛世诤臣孙嘉淦》(王芳著)、《忠清亮直祁雋藻》(梁盼著)、《破冰醒世徐继畲》(徐建宏著)；副册为《裴氏家风家训》《讲给党员干部的山西廉政故事》和《讲给青少年的山西廉政故事》。丛书由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山西省作家协会精选创作实绩突出、全国影响力较大的赵瑜等作家撰写，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在山西悠久的文明史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清官廉吏，他们各自在所处的时代中担当重任，一生不改为民之本心，坚守为官为吏之应有品行；他们洁身自好、刚正不阿、胸怀天下、心系苍生，被老百姓口口相传，成为后人做官做人的榜样。因此，以纪实文学作品的方式，系统和客观地描写这些清官廉吏的人生轨迹与为官政绩，既是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又能古为今用，扶持正气，抨击歪风邪气，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尤其当前，全党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用讲故事的方式宣传清风正气，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持续推进廉洁文化和清廉山西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全力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中，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工作。

笔者作为这套丛书的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有幸参与了项目确定、方案论证和部分书稿审读等工作，并且是其中一本书《家正国兴话裴氏》的主编，体会深刻。从社会价值方面看待，“山西廉政文化丛书”艺术地讲述山西古代清官廉吏的故事，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提出的“深入挖掘能吏廉政文化”的重要举措，是推广和宣传有关廉政文化理论、廉政文化史和廉政人物的重要读物。通过这套丛书的推广宣传，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廉、尚廉、守廉氛围，把清廉文化作为基础和先导，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山西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文育人、以廉润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清廉价值理念，培育清廉政商文化，传承清廉文化基

因，夯实清正为官、廉洁从政的思想根基。

从文化方面考量，山西举全省宣传文化之力，用文学图书方式，把十位三晋清廉先贤和裴氏英才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呈现出来，提供给多层次读者阅读，有助于大家加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追寻中华廉政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广大读者从清廉先贤的高风亮节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大家推动当今进行的文化事业改革发展不断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每一位山西宣传文化系统人士的责任。事实上，这项工程的实施，既是山西文化界实实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行动，也是对前人廉政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和借鉴的成果，更是向廉政文化致敬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充分展示山西传统文化的魅力、山西廉政文化价值的实力、山西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能力。

创作手法

“山西廉政文化丛书”中讲述的狄仁杰、白居易、柳宗元、司马光、薛瑄、于成龙、陈廷敬、孙嘉淦、祁雋藻、徐继畲，还有裴氏家族等漫长古代历史中的廉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身处世之本，那就是家国情怀；他们始终把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放在首位，把维护人民的利益当作为官的核心要务。可以说，这些人物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数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山西人在廉政文化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和功绩。

这套书追求的总体效果是：集思想性、史料性、文学性、可读性、观赏性于一身，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具体说，就是谋篇布局有创新意识支撑，言必有据，史料可靠真实，只以学术界现有定论为基础，不做歧义研究、考辨和训诂；叙事行文不同于史志笔法，以清明健康、明丽流畅的文学语言成篇，不做照搬式简单解读，而是将物态化的历史遗迹、抽象化的档案资料、民俗化的文化现象与写作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给古老厚重的三晋廉政文化注入现代气息和新的思考，抬升三晋廉政文化的整体价值和人文地位。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要求，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首先是作家要有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从素材搜集调查、主题思想确立、梳理材料过程，到设置写作大纲、文体选择、语言文字，都要全身心投入，决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或家族的一己目的而做事。其次是要有作家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如果只是罗列传主的生活简历，渲染逸闻趣事，不加研究，不放到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评价，那也一定是理想作品。据笔者观察，“山西廉政文化丛书”在实际创作中，每位作家都努力把丛书主旨贯穿到全书中，把读者的兴趣引入到所写廉政文化人物本真世界的层面，力争让读者认识到这位廉政文化人物的社会贡献与历史价值、特殊性与感染力，通过形象生动的描述与阐释，对这些历史上的廉政文化人物进行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如此，他们对各自笔下的那个有特殊性的历史人物，在占有足够资料前提下，都充分表达出了自己的独特认识与鲜明观点。

为历史文化人物撰写文学传记，还必须处理好史料

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我们从“山西廉政文化丛书”中可以清楚地读到这方面的共性：每一位作家都尽力把有关传主的正史、研究文献、民间传说和田野调查资料，进行认真梳理分类，对所写传主及其他身边人物确定基本的认知与判断；然后，从史料中铺陈出来，进入文学创作层面，本着史料服务于创作、创作是史料的升华这项原则，进入写作阶段。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是标准的文学作品，突出了文学的元素，比如人物性格、故事魅力、场景特点、语言风格，等等。

具体到每一部书中，作家们将传主的人生经历，作为一种现象，提出了一些让读者思考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家庭问题。比如《清廉典范白居易》的作者赵瑜，此前，他曾花费十年时间，创作完成了近40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文学《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出版后广受各方好评。承担《清廉典范白居易》写作任务后，他在《白居易传》把白居易作为文学家展现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丰富的史料，把重心放在白居易的清廉为官方面，突出了白居易立志改革制度、尽力为普通老百姓利益着想的好官形象，提出了一些关于体制设立、人才选用、奖励机制等问题，富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塑造出鲜活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是这套丛书每位作家都特别重视的环节，大家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设置了跌宕起伏故事情节；叙述则是采取了富有韵味和艺术张力的语言，甚至采用一些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这些都是为了增强可读性，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得启发。郭天印、陈为人、韩振远、宁志荣、孙国强等各位丛书作者，都是善于描写人物和故事的作家。他们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立体的、饱满的、有个性的形象，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特色

概括“山西廉政文化丛书”的特色，首先是内容明确。11种正册和3种副册，都是围绕“清、廉、勤、正”四个方面展开，把当今时代的理念和古代清官廉吏的事迹融为一体，把廉政文化理论、廉政文化史和廉政人物有机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山西古代的清官廉吏予以深度刻画，实现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次是写法有创新意识。作家们突破一般性人物传记的线性写作模式，以传主一生中最能体现廉政文化的重要事件为主线，以学术界现有定论为基础，以形象生动、流畅有味味的文学语言进行描写和议论，体现出文学韵味，人物形象鲜明，艺术表达到位，是作家们一次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创作实践，丰富了大家的写作经验。

再次是时空覆盖面广。所选廉政文化人物，在时间上横跨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山西籍清官廉吏，有利于赓续清风晋韵；在空间上，传主廉政事迹不限于只在山西发生，而是辐射全国，把他们在不同地域的廉政文化行为都展示给读者，有利于三晋廉政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体现了山西廉政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辐射效应。

最后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这套丛书装帧设计崇尚简约美感。以“廉洁”为本位，力避奢华、返璞归真，既做了低成本的考量，也注重呈现古朴典雅的风貌，保持了廉洁装帧和廉政文化的高度一致。每册配有图文折页十幅，更为生动鲜活地展现出传主的生命轨迹和清廉道路。

山西廉政文化虽然自身的特征非常明显，但它决不是封闭的，也没有排他性，甚至连域外文化也不抗拒。这种精神，为三晋历史廉政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我们在“山西廉政文化丛书”中，能感受到。从每一部作品所讲述的历史廉政文化人物可以看出，这些作家都不满足于已有的样式，总是在探索和创新，在发展中体现他们的价值。

山西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套丛书介绍的清官廉吏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像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经历了历史长河中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熠熠生辉。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些优秀的清官廉吏就是一面面镜子，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是高度浓缩的中华魂魄。让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和读者见贤思齐、对照自身，向他们学习，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大写的“人”。



从《断章》看卞之琳的诗艺

何亦聪

你站在桥上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的《断章》，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关于这首仅仅四行的短诗，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如“相对说”(卞之琳)，“装饰说”(李健吾)，或由卞之琳痴恋张充和的故事敷衍而来的“爱情说”。其中“爱情说”更因近年的自媒体传播而被反复演绎，《断章》在大众认知当中几乎变成了一首标准的情诗。诗无达诂，以上说法，都可以成立，但我想回到卞之琳诗艺的整体视野中，来谈谈《断章》的艺术价值。

卞之琳是北京大学英文系出身，又是重要的翻译家，他对20世纪初期英国诗风的变化十分熟悉。在1956年所写的一篇关于霍斯曼短诗的随记中，他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的浪漫风气，尤其是桂冠诗人丁尼生诗歌里“轻飘飘的牧歌世界”与“破晓时分的典型感伤”，然后说：“20世纪的诗人再不能那样自我陶醉地写诗了。”当卞之琳写下这句话时，他想到了什么？我猜测他必定是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徐志摩——徐志摩岂非就是中国现代诗人中自我陶醉的典范？果然，到了1979年，卞之琳写文章谈论徐志摩和他的诗作时，就露出了某种微词：“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19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有趣的是，卞之琳对戴望舒诗作的不满，也在于其早期作品“感伤情调的泛滥”，以及中期作品“绝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怅惘”。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自我陶醉”或浪漫主义风格的警惕与对抗，构成了卞之琳诗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这种警惕与对抗，一方面与瓦雷里、艾略特等欧洲现代诗人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在于卞之琳自身的困境：从个人性情来看，卞之琳恰恰很容易陷入感伤和自我陶醉，对此，他在作诗时虽深自抑制，仍不免时时流露，如《秋窗》里的几行：“看夕阳光在灰墙上/想一个初期肺病者/对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少年的红晕。”这样的诗趣不能说不好，但终究与卞之琳的自我期许相距甚远。

在创作过程中，卞之琳始终为某种紧张性所困扰，如果借用美国诗人奥登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去学习成为自己之后，如今他发现必须开始学习不要成为自己。”而《断章》就是在这种“不要成为自己”的执念下产生的。问题在于，如果说诗人不要成为自己，他应当成为什么呢？卞之琳给出的答案也在《断章》里——看风景人。诗人是观看者，而非介入者。为了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多的生活，他必须使自己变得尽可能透明。换句话说，一个总是自我陶醉的诗人，必定不能成为合格的“看风景人”。

因此，《断章》不仅是卞之琳最为克制的作品，亦是其诗学思想的结晶。它并非妙手偶得，而是水到渠成。卞之琳曾谈到《断章》的创作缘起：这本是一首较长的诗作，后来几经删改，最终只保留了四行。我们可以猜测卞之琳删掉的是怎样一些诗行，可能是感伤的、浪漫的、自我陶醉的，可能是戏剧性的、给人过多想象空间的，也可能是松懈的——卞之琳的诗歌有时会因过于追求生活化或者口语化而显得松懈，尤其是，他总想驾驭自己并不那么熟悉的“京白”。

《断章》不仅保留了原诗中最为精粹的部分，也保留了卞之琳诗艺的精华，它用哲思抵消感伤，用趣味中和虚无，用多重自我的并置来达到无我之境。在艺术上趋于极致的同时，避免了所有可能的破绽——既不过度自怜自伤，也不跳跃和晦涩。即便是卞之琳所惯于表达的那种古典式的哀愁，在这首诗里也只是点到为止。一切都是刚刚好。

经典漫谈 (18)

追求创作的内在秩序

汪惠民

写作要面向丰富性，同时，它还要面向秩序。曾经和很多青年作家聊阅读与写作，他们大多是谈外国文学。我能理解这样的“远游”冲动。尤其在青春焕发的年华，谁不想见识更多呢。见识了更丰富的言语技艺，见识了更丰富的社会性，然后呢，这些文学游子大部分没有归来——不是他们不愿意归来，是没有能力归来，没能在他的言语中给我们建构一个秩序的世界。

有一次，看完一位青年作家的稿子，就忍不住给他打电话。那稿子，写得乱糟糟的，但在作家自己看来，他的作品是在向谁谁谁(当然是一位外国作家了)致敬。我说的乱糟糟，不是抹杀他的锐意进取、重视呈现生活丰富性的努力，不是对他的才华横溢的无视，而是指他陷入了文学游子的狂欢，没有将“多闻”发酵，进而转化为对故土生活的再审视、再呈现。日常中，我们的社区没有普遍性的多人杂居的状况，我们没有战乱中惊恐的生命体验，我们也没有经历“上帝死了”之后人间自治途中的荒唐故事，关于性爱、关于财富，我们也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和道德规范——所以，我和他说，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不能简单相互置换。

我当然没有能力判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好的。而且，今天我们讲的，并不是这个话题，而是，你可能需要找到一个使无边丰富性向着秩序运行的路径。夜空里点点繁

星，如恒河沙数——然而，人是有着天然的秩序冲动的，绝不满足于眼前的“一盘散沙”。人的内里其实是有个决心的，要看自然意志在微观、中观、宏观各层级上的“作品”。于是渐渐地，至少在东方，人们建立起了这样的认知连接，天象、地理与人文获得了秩序性与一体性描述。碰巧的是，我们后来获得了光学与射电望远镜的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天体，果然在某种秩序里运行——令我们震惊的是，它们运行的图景，居然早就在我们的料想之中，一些像池水中的涟漪，一些如激流里的涡旋。

在克服概念化图解式写作弊端的时候，生活、世界与人的丰富性当然是我们的叙事良药。但终究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在无限的“丰富性”当中，我们注定是有限的存在。所以，我们也要警惕，在“丰富性”的魅惑里，我们不是真的变成了迷路的孩子。



一家之言